

# 试析双墩遗址植物类刻划符号

徐大立

(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 安徽蚌埠 233000)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orts and contents of plant carved symbol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Shuangdun Site in Bengbu, as well as tries to decode the effects and meanings of this symbols executed on Shuangdunness.

Key Words : Shuangdun Site Plant Carved Symbols Decode Contents and meanings

**内容提要** 重点介绍了蚌埠双墩遗址的自然环境、植物类刻划符号的类别与内容。并尝试解读这些刻划符号在双墩先民生产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 双墩遗址 植物类刻划符号 内容和意义试析

中图分类号 K871.13

文献标识码 A

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安徽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它以独特的文化面貌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在一定区域内同时期古遗址出土遗物的共性特征,证实了淮河中游地区存在着以蚌埠双墩遗址为代表的新考古学文化——双墩文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文化内涵是出土了一批年代较早、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且极为珍贵的刻划符号,被认为这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在出土的 607 件刻划符号中,植物纹刻划符号所占比例最少,仅只有 41 件,占总数的 6.75%。但是,其表现形式有树木、灌木、蓬草、花瓣、水草、籽粒等多种形态,反映出采集、捕鱼、狩猎、养蚕、水稻种植以及物候历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本文尝试着解读这些植物纹刻划符号所蕴含的内容和意义,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根据资料<sup>[1]</sup>:在距今 7000 年前的气候条件下,淮河流域分布着亚热带与落叶阔叶林混生的长绿阔叶林带,林下分布着中生、旱生的草本植被。树木的类别有栎、栗、胡桃、榛和榆、柳、桑、梅等。林下或沟坎、断崖边生长着酸枣、柽柳等灌木丛。在广阔的水域内也有一些水生植物供人们食用。通过分析,尽管遗址周围有许多木本和草本植

物分布,然而作为食物来源的植物并不多,这与热代雨林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条件制约着采集经济的种类和空间,所以,双墩遗址所反映的采集经济并不发达,或许这就是植物类刻划符号较少的一个原因。但是,这并不妨碍双墩先民对身边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我们通过对植物类刻划符号内容的分类与研究,可以了解双墩先民是如何认识和利用自然条件来从事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活动的。

## 一 水草形刻划符号

远古时期,淮河穿过荆涂二山由西向东而来,水面一下变得宽阔平缓。其上游有颍水、涡水注入,其下有浍、濉、潼、沱水系与其汇合。其间分布着众多的湖泊港汊,水产资源非常丰富。因此,捕捞业是双墩先民的重要生活手段之一。在刻划符号中,有关渔猎的内容就占 70% 以上。水草形刻划符号虽然数量不多且均为残片,但也准确形象地表现了其不同的形态。

水草形刻划符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细密卷草形(91T0621(7):85),有点像金鱼草,在浅水中为密集簇拥状分布。一种为叶条形(86 发掘品:74),叶片较宽长,均呈束状分布。由于器底残

缺,没有发现鱼的形象。但是在侯家寨遗址<sup>[2]</sup>发现了鱼与水草的完整刻划符号(侯T2(4):107),这幅刻划先用压划纹画出水草形状,然后在上面刻划出鱼的形状(图一)。可能是表现鱼儿在水草中游动的情形,或者是表现鱼儿卧在水草之上产卵时的状态。水草一般生长在河湖沟汊的岸边或水湾处,属于浅水水域。鱼群在休息、产卵时喜欢寻找这种幽静和水草多的地方。这也是容易捕获鱼类的地方。双墩人掌握了鱼的习性,才刻划了适宜鱼群栖息觅食、交配产卵的水草形象。

## 二 叶脉形刻划符号

叶脉形刻划符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写实的手法,即以细密的线条将叶子的脉络刻划得清晰可辨。有些类似蕨类植物,有些类似桑叶等植物的叶子。

另一种是图案化的叶脉形刻划符号,以刻痕细密、布局规整为特点。92T0723(27):54以竖线和短斜线组合,有规律地刻划出多组叶脉状的图案,刻划非常规整,已具有抽象刻划的特征。在陶器底部要完成这样一幅刻划,刻划者必须用耐心和纯熟的技巧才能完成,甚至要借助一些工具才能将线条刻划得那么平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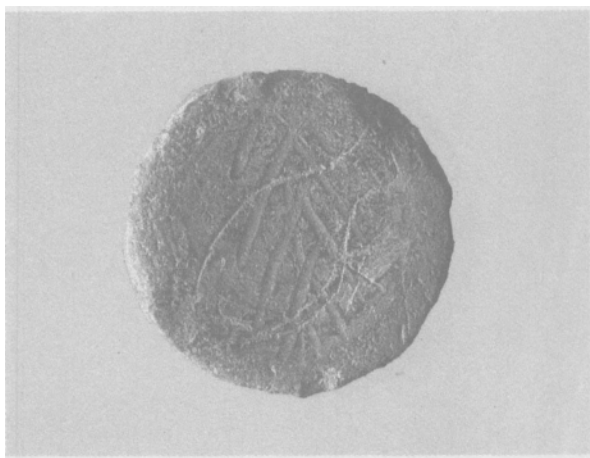
86发掘品:17,92T0722(20):48为“凸纹”植物纹图案,这种图案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减地剔刻”方法,而是用“泥条贴塑”后再精心修整的方法来完成。这是通过观察泥条剥落后露出平整的底子时分析出来的。

双墩先民如此精心细致地刻划这些植物的叶子,想必与其生产、生活有着非常密切和重要的联系。那么,这些叶脉形刻划分别代表什么植物,在双墩人的生活中具有什么作用,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通过研究知道,所有刻在器物底部的符号,都与双墩人的生产、生活或者精神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植物形象能够刻在碗底上,一定有着特殊的意义:或许是食物,或许是草药,或许是喂养家畜和蚕的饲料,或许是制作某些物品的材料,现在我们无法准确的来解释它们,只能笼统地加以推测。

## 三 树木、枝杈和陷阱类刻划符号

树木、枝杈和陷阱类刻划符号的数量不是很多,除了单纯的表现树木的形象外,大多与捕鱼、狩猎等活动有关。可以看出,双墩刻划符号具有很强的记录和写实的特点。特别是组合符号,可以直观地看出和领悟到刻划者所要表达的意思。

### 1. 树木形刻划符号



图一// 水草与鱼刻划符号

树木形刻划符号以主干和侧枝构成,侧枝为向上的斜枝。两边对称,不完全写实,具有抽象的意味。

93征集品3是一个大树与野猪(也有人认为是“熊”)的组合符号,可以看出树枝粗壮高大,但侧枝稀疏,可能是为了表现树枝遮蔽下的野猪形象(野猪形象用压划的方法画出来,因划痕较浅不易辨认)。这幅刻划的精妙之处是,刻划者不表现隐蔽在树上的猎人,而是借用猎人的目光透过树枝来观察猎物,随时准备出击将猎物擒获。这是一幅借树木隐蔽自己、伏击野猪的绝妙图解。在双墩刻划符号中有一组关于狩猎野猪的刻划,反映了从设置陷阱、设伏、围猎、擒获猎物的全过程,而上述仅是其中的一幅。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构图都不反映狩猎者的形象,而只是反映狩猎前的准备活动和擒获猎物的过程。

92T0723(26):20则显得枝干低矮,侧枝繁密,上有稀疏的枝叶。树形刻划对称规整,有点图案化(图二)。86T0720(4):15虽然残缺,仍可以看出对称规整的树木形象。双墩遗址表现树木的刻划符号数量不多,结合刻划符号中有养蚕、结茧和编织方面的内容。这些树形可能与桑树有关。

### 2. 枝杈形刻划符号

枝杈形刻划符号有单体符号和组合符号,应为捕鱼工具。组合符号由象征鱼形的抽象符号(𩺰)、简化符号(𩺱)与枝杈形符号构成。


这种表现鱼在枝杈丛中的刻划,原来被认为是利用枝杈在刺鱼,但是从形态上看,这种枝杈形的工具不像是用来刺杀鱼的,因为在刻划符号中已经出现了矛、叉和箭簇之类的工具,其端部尖锐利于刺杀。而使用枝杈形这样的工具来刺鱼则显



图二// 树木形“凸纹”符号



图三// 枝杈捕鱼形刻划符号

得很不合适。特别是我们经分析认为,“”符号一般是表示“群鱼”的概念。所以,以前将这类符号解释为刺鱼就显得有些勉强(图三)。



最近在翻阅一些资料时<sup>[3]</sup>,发现在云南少数民族中,至今还保留着“香把”捕鱼的方式。在云南澄江抚仙湖,每到汛期,当地渔民就上山割来约1米长的蕨蕨棵或清香树枝,扎成相当于稻草把大小的“香把”竖直放入靠近湖边的水域或浅水石缝中。“香把”因水的浮力而张开。随水而来的“抗浪鱼”嗅到“香把”的清香后,就会纷纷潜入“香把”中产卵。此时将鱼篓、网兜置于“香把”下,连同“香把”一同提起,张开的“香把”随着离水而收缩,鱼儿就被夹在其中。此时抖动“香把”,鱼就会落入鱼篓或网兜中。

可以看出,这种用“香把”捕鱼的方法同刻划符号所表现形式很相似。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双墩人为什么要将鱼同枝杈刻划在一起。当然,7000年前双墩先民用此类方法捕捉的不一定是“抗浪鱼”,但是利用鱼产卵时喜寻水草和阴暗处的习性,用成束枝杈、茅草来诱捕鱼群,确实是经验与智慧的结晶。

### 3. 用枝条遮蔽陷阱的刻划符号

双墩刻划符号中有一些是表现陷阱的,一般是用树枝编成十字形加方框或圆形为骨架,上面覆盖树叶或草皮,以遮住下面的陷阱。当野兽路过时便会落入陷阱。此类刻划符号的数量较多,可以看出,利用陷阱来捕获猎物是双墩先民经常使用的方法。

86T0720(3):75 为十字形加方框的骨架,其上覆盖着凌乱的枝叶,用以遮蔽陷阱的洞口。值得注意的是其左侧有一个四叶花形的符号,这是双

墩遗址刻划符号中特有的、表示物候历法的标志性符号,它的意义稍后加以讨论。86T0720(1):37 与 91T0819(18):33 中的“”“”在刻划符号中均表示陷阱的意思。其上分别有十字形加圆形框架和十字形加凌乱枝条状的遮蔽物,这都表示了挖掘陷阱和伪装陷阱的方法与过程。这是双墩先民在狩猎活动中经常使用的技能,也是部族猎人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技能。从这个角度看,双墩刻划符号似乎具有教学的功能。

## 四 蓬草、籽粒类刻划符号

### 1. 蓬草形刻划符号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以纤细的线条刻划出一簇或多簇的蓬草形象(86T0820(3):9;86 发掘品:19;86T0820(3):11;86T0720(4):19)。一种是用压划的方法压划出类似较宽叶片的多簇蓬草形象(91T0719(15):38;92T0723(27):45)。这两种类型的刻划所反映的内容都是苗草一类的植物,这一部分刻划符号极可能与原始种植业有关。

### 2. 籽粒形刻划符号均残,可分为三种类型。

91T0719(15):31 是椭圆形多弧线构成的籽粒形刻划符号;86T0720(3):14 是不对称多弧线构成的籽粒形刻划符号,可以看出上面有类似稻穗上的芒刺形状。92T0523(10):156 是黑陶碗底上布满类似稻米的印痕。

蓬草形刻划符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青苗一类的植物,而与籽粒形刻划符号联系起来就更容易想到原始种植业。根据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和下游的龙虬庄遗址均发现了水稻遗迹,那么,这些刻划符号表现为水稻的育苗和收获是完全可能的。

种植业起源于何时尚不可知,目前已知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已有12000年左



右。河南贾湖遗址发现了距今8500年左右的稻类遗迹。说明至少在8500年前淮河流域已经出现了水稻种植。按此推测,距今7300年左右的双墩人也应该进入了原始农业时代。在贾湖遗址的发掘报告中,称发现的采集品仅有栎、菱角、野大豆等,数量种类太少,认为可能是埋藏条件所限不宜保存的缘故。另外又发现了稻壳的印痕和米粒,推测是水稻种植已大致满足人们对植物类食品的要求而造成的。龙虬庄遗址的环境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遗址周围有许多木本和草本植物分布,然而作为食物来源的植物并不多。遗址中发现的采集类食物仅为芡实和菱角,均为水生植物。作者认为龙虬庄先民的主要农业经济——稻作经济呈上升趋势,已满足了人们对植物类食品的需求。

作为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和下游的龙虬庄遗址都称采集经济不发达。这就从侧面证明了处于淮河中游的双墩遗址采集经济也不会发达。采集经济是人类早期生存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进入新石器时代,采集业依然是补充食物的来源之一。即使在现代社会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间,采集也是很重要的食物补充。因此,一般说来,采集经济在原始先民的生活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从双墩遗址的发掘材料看,虽然发现了碳化的果核和在陶塑品中有菱角等水生植物的造型,在数量和种类上说明采集经济还是较弱的。

另外,植物形刻划符号所占的比例太小也与这种推测相符。我们在对刻划符号分类时发现,某一类刻划符号所占比例的多少,应当与双墩先民生产、生活的方式侧重点有关。例如,有关渔猎的刻划符号就占约70%以上。据此,我们认为采集经济已不是双墩先民的主要食物来源。

那么,双墩遗址有没有稻作经济呢?由于3次发掘工作都集中在遗址东侧的大灰沟内,出土遗物均为双墩先民倾倒的废弃物。尚没有在居住区、墓葬区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另外在挖掘清理中也没有采用浮选法来获得植物籽粒的标本,所以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双墩遗址有稻作经济。但是,我们可以从4个方面间接证明稻作经济的存在。其一,淮河上游的贾湖遗址和下游的龙虬庄遗址均出现了稻作经济,一般说来,同纬度的不同地区,植被、气候等环境因素是相同或相近的。贾湖遗址、双墩遗址、龙虬庄遗址同在北纬32°~35°之间。时代上有连续性。有着基本相同的自然环境条件,在水稻种植方面也应该有一定的同一性。双墩遗址位于淮河中游且年代又居于两者之间,也应

该有了稻作经济。其二,我认为蓬草形和籽粒形的刻划符号与水稻的育苗、生长、收获应该是有关联的。通过对刻划符号的分析,我们认为:几乎所有的刻划符号,都与双墩先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那么,这些经过精心刻绘的内容就不会是毫无意义。其三,双墩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其中有储藏器、炊煮器和酒具等,如大口深腹罐、大陶釜、澄滤器、甑、甗、杯等。这些用具的出现也从侧面证明了当时有粮食生产的可能。其四,在陶支脚的红烧土块中发现了类似稻壳的印痕,在黑陶碗的假圈足上发现了类似稻米的印痕。因此,双墩遗址有稻作经济是完全可能的<sup>[4]</sup>。

#### 五 四叶花形刻划符号与物候历法

物候历法是人类早期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一项重大发明。人们在对日升月落、斗转星移、寒来暑往、四季往复、春花秋实、虫鸣鸟飞等自然现象长时间的观察、体验以及不断的摸索总结后,才掌握了自然界变化的这一规律。物候历法的出现与使用,对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出现,物候历法更是与其息息相关。双墩遗址物候历法的刻划符号以四叶花为代表,集中反映了在捕鱼、养蚕、狩猎以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内容。






##### 1. 四叶花单体符号

86T0820(G):50,写实类花瓣形符号。略残,可看出应为四叶花瓣。86发掘品:103,略微简化的四叶花瓣形。

##### 2. 四叶花组合符号

92T0723(Q6):68,残。结合其它类似符号,可以判断刻划者先是用3道横线和3道竖线构成的“十”字形符号,四端对称均有三弧线符号,然后在十字中心划上四叶花符号。93征集品:6,为四叶花符号,上面为锯齿形符号与其组合。92T0721(Q7):19,为四叶花符号,其上为内弧四边形符号与其组合。

##### 3. 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四叶花符号

86T0720(3):93,组合符号。为“”“△”“”3种符号组合。双弧线交叉代表“群鱼”,三角形代表锐器或抄网,左上侧为四叶花符号,表明四叶花开时捕鱼的季节开始了。86T0720(4):51,组合符号,为“”“”“”3种符号组合。除四叶花外,另外2个符号均与甲骨文、金文的“井”和“系”相似。在双墩遗址中出现了一批与养蚕有关的刻划内容,如蚕吐丝结茧、化蛹为蛾以及表示蚕茧的符号等等,其中蚕茧符号与商周时期甲骨文

中的“丝”、“系”极为相似。应当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这幅组合符号拟表示花开时节蚕上架结茧的情景。86T0720 (1):37,组合符号,前面已有过说明,为十字形符号、方框形符号同四叶花符号组合。拟表示花开季节,到了可以布置陷阱俘获猎物的时候了。

以上几幅刻划符号都有一个标志性符号—四叶花,分别与捕鱼、养蚕、狩猎内容的刻划符号组合。可以理解为严冬已过,春暖花开,到了捕鱼、狩猎和养蚕等生产活动的时候了。很显然,四叶花已经成为象征气候的固定符号,是原始物候历法的表现形式。这也是我国最早关于物候历法的记载。

以花作为物候历法的标志,有着极深的文化渊源。许多学者都认为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以花为图腾的氏族—华族(即花族,华、花一字)或者花图腾曾经是氏族制繁荣时代部落联盟的共同的徽帜。中华民族、华夏的称谓皆与花有关。苏秉琦先生曾认为:“华人即花人。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了爱花的民族,植根于过去氏族标记的族花。花—华,又有日月光华之说,何新认为:“华”是“晔”的省文。《说文》:“晔,日光也。”所谓华族,就是崇拜太阳和光明的民族。双墩先民以花为物候历法的标志,说明对花的崇拜,对太阳的崇拜。这些已经在刻划符号的内容中充分反映出来。

在将四叶花符号整理归类时,笔者有一个依据不太充分的想法,现提出来请大家指正。笔者认为四叶花符号有向“亚”字形演变的过程,即从象形刻划符号逐渐转为抽象符号(所谓亚字形符号就是“井”字形符号四端封口)。

91T0819 (17):80,略残,四叶花符号。花瓣已由圆弧形向矩形变化,近似于“亚”字形。92T0721 (30):42,四叶花的叶子由弧形完全变成了矩形,成为“亚”字形单体符号。92T0722 (26):17-1,组合符号。为四端封口的“亚”字形符号与植物形符号组合。91T0719 (15):62,组合符号。为四端封口的“亚”字形符号与圆圈纹符号组合。

由四叶花形过渡到亚字形是一个重要变化,虽然都是表现物候变化的符号,四叶花只是固定表示某一个节气,但“亚”字形符号已经具有四面八方、四季转换、循环不已的意义。后者已成为原始天文历法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被传承下来。值得注意的是,湖南安乡汤家岗出土了多件新石器时期的白陶圈足盘(年代距今6500年),在陶盘外底戳印八芒太阳纹(和亚字形符号近似),其中心位置正是一朵四叶花<sup>[5]</sup>。这个图案恰好证明了

四叶花、亚字形与太阳的关系,也证明了这组符号的认同范围已经跨越了安徽到湖南之间的广阔地域。从双墩遗址的四叶花、亚字形单体符号、组合符号到汤家岗遗址的八芒太阳纹图案,再到商周时期的亚字形族徽、亚字形大墓乃至汉代铜镜上的“四蒂纹”图案,使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加深远和广阔。

《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俚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记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这段话包含了后人对淮河流域的“人文初祖”伏羲氏诸多发明创造的赞颂之情,而且透露了远古社会文明初现的具体情景。那么,传说中伏羲氏的诸多发明创造,究竟处在中国原始社会的哪一个时段呢?通过对植物纹刻划符号的归类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距今7300年左右的双墩先民,已经初步具备了传说时代中的许多知识和技能,对天文、地理、自然现象都具有了相当的知识和经验。并且在生产生活中广泛应用。同时他们将这些知识与经验都刻在陶器上以流传后人。正是双墩遗址刻划符号的发现,才使得我们相信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传说时代中的许多知识与发明已经产生了,这显然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但确实已经成了明明白白的信史。

[1] 本文资料主要参考了张居中《舞阳贾湖》和张敏《虢虬庄》发掘报告中关于环境的部分论述。

[2] 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一期的年代、文化内涵与双墩遗址相同,也出土了一批器底刻划符号。其刻划特征与双墩遗址刻划符号完全一致。

[3] 《结在丛林山水间——云南民族采集渔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文章写完不久,就看到张居中、尹若春的文章《淮河流域史前稻作农业与文明进程的关系》,证实了我馆提供给他们用来测试的双墩遗址红烧土中印痕标本确实是栽培稻的印痕。文中说:“此次发现了12个稻壳的印痕,其中可以判断其类型的有9个,其中2个为阔卵形,长宽比为2.0~2.14毫米,判断为粳稻,占22.2%;4个为籼稻,占44.4%;3个为中间型,占33.3%”。说明双墩遗址已经有了水稻种植,也证实了我的分析和推测。

[5]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5页。